



辗转陕北三地办学

□ 谢煜桐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行程二万五千里、纵横11个省的长征胜利结束，陕甘根据地成为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地。1935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进驻瓦窑堡，不久即恢复了中央党校的建制。从1935年11月起至1937年2月，中央党校随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在这不到一年半时间里，迫于当时的战争形势，党校先后在陕北三个地方辗转办学。

在瓦窑堡复校后，已不再沿用“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的校名，直接称为中共中央党校，校址在安定县立第二高级小学（今子长县瓦窑堡小学），这是中央党校在陕北的第一个校址。校长由董必武担任，成仿吾、冯雪峰任教员，并各兼任一个班的班主任。不久后，习仲勋、张策等人来到中央党校工作或学习，此外还有一些地方和军队干部，以及从苏区外面来的知识分子也到中央党校学习，中央党校遂发展成为三个班，分别由成仿吾、习仲勋、冯雪峰担任班主任。稍后又成立了一个高级班，主要培训党校教员。党中央到达陕北时，正值中日民族矛盾

进一步加剧，面对新的时局，1935年12月党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和策略。中央党校在瓦窑堡的课程有政治常识（含时事政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等）、党的建设、苏维埃建设、游击战争等，分别由李维汉、董必武、成仿吾、冯雪峰、张云逸等主讲，此外党校还进行军事训练。1935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在党校举行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毛泽东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党校的学工人员都聆听了这个报告。党校的很多同志是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印象极为深刻。据时任班主任的习仲勋回忆：“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会上，毛主席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任务，完整地阐述了我党的政治策略，批判了党内过去长期存在的‘左’的倾向。我凝神谛听毛主席的报告，觉得他讲的完全合乎实际，路线完全正确。我感到迷雾顿散，信心倍增。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毛主席的

讲话，心里高兴极了。”1936年2月17日，中共发布《东征宣言》，2月20日，新组建的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在毛泽东、彭德怀的率领下东渡黄河，进入山西。由于蒋介石、阎锡山阻止红军东进抗日，1936年5月，毛泽东率东征军返回陕北，跟随部队从山西回来的部分知识分子和工人被安排到党校学习，党校规模有所扩大。

党中央在瓦窑堡的时间不算太长，东征红军从山西返回后又举行西征以扩大苏区，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作准备，此时国民党军队乘虚进攻瓦窑堡，1936年6月21日，党中央主动撤离瓦窑堡，7月初中央党校随中央机关到达保安（今延安市志丹县）。到保安后，中央党校在刘家坪和任家坪两村之间修建了临时校舍，这是中央党校在陕北的第二个校址。当年的一棵古槐树至今还在，当时党校学员曾在这棵大槐树下上课、讨论。在保安，党校设研究班、高级班和四个普通班。研究班就是教员班，当时党校的教学一般都是先由董必武、成仿吾等人给研究班讲课，然后再由这个班的学生（教员）分头去给其他班讲课。与在瓦窑堡相比，课程没有大的变化。

1936年10月，红军西征占领定边等地后，因工作需要，同时也是为了解决吃粮问题，中央党校由保安移至定边，这是中央党校在陕北的第三个校址。

总的看，从中央红军长征落脚陕北到进驻延安之前，中央党校辗转陕北三个地方，条件虽然艰苦，办学却一直顽强地坚持着。在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造成民族危机不断加重的情况下，党校为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及时地培养了一批批急需的领导骨干。



□ 陈振熙

“方寸之间，气象万千。”这是对篆刻以其微小尺寸展现丰富审美风格的高度评价，也是对艺术精神契合文化理念的间接揭示。《道德经》曰：“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篆刻创作中小与大、简与繁、静与动等方面的对立统一，体现了艺术对文化的贯通和诠释。

篆刻印章起源甚早，据《后汉书·礼·祭祀下》载：“尝闻儒言，三皇无文，结绳以治，自五帝始有书契。至于三王，俗化雕文，诈伪渐兴，始有印玺，以检奸萌，然犹未有金玉银铜之器也”。殷商时代已盛行刻字艺术，而汉代印章达到兴盛。明代中期以降，篆刻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印章传统意义上的实用功能，成为纯粹的艺术创作形态。

一般认为，篆刻艺术是篆法、章法、刀法三者的完美结合，而篆法的功底在于书法，清代著名篆刻家邓石如就主张“印从书出”。诚然，篆刻离不开书法，但其却以追求独立的艺术价值为旨趣，形成了与书法不同的审美体系。相比于书法能够见出流动之美，篆刻由于篇幅和章法的特点，以静逸和古穆为基调。读者欣赏书法作品时，随着视线的移动，心灵的感知也跟着起伏变化，当美的律动和情感的波动合拍时，便产生雍容典雅的愉悦感，所以书法之美在于“雅”。而篆刻把读者的视线聚焦在方寸之间，审美的情趣落在了对纵与横、凹与凸、断与续等细微之处的品味中，所以篆刻之美更在于“趣”。其实，因为篆刻具有实用的功能性质，所以很长时间被看作不入流的技艺，自古亦有“雕虫篆刻，壮夫不为”的说法，苏

轼在《次韵张安道读杜诗》中写道：“简牍仪刑在，儿童篆刻劳。”篆刻被视同儿戏，不足挂齿。虽然曾经作为雕虫小技，“不登大雅之堂”，但是小而趣的美学价值却为篆刻开辟了宽广的道路，使其发展成为与书法、绘画并驾齐驱的一门艺术。

雅与趣，源于书法和篆刻之于视觉审美的心理需求，却借助文化的滋养衍生出更加丰富的内涵。“雅”需要外界的文化认同，书法家虽然可以按照自己的创意，在纸上纵横驰骋，却摆脱不了特定范式的约束。“趣”则发自内心的文化自觉，自娱自乐的满足是普遍的创作心态，别出心裁的构思和突如其来灵感是常见的创作动力。“雅”的对立面是俗，为了规避和防范落入各种俗套，书法创作设立了很多“禁区”，如傅山在《训子帖》中提出：“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率直毋安排。”在他看来，“四毋”是避免书法落入俗套的准则。甚至一种字体过于风靡，人们也容易跟风随俗，如黄庭坚在诗中批评了大家盲目跟学《兰亭序》的风气：“世人尽学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谁知洛阳杨风子，下笔便到乌丝栏。”而“趣”并不排斥俗，“趣”有时是对俗的超越，通过技巧的运用，化腐朽为神奇，把原本平淡无奇的东西转化为趣味横生的艺术。篆刻篇幅虽小，却给予了作者广阔的表白空间，一些不够正式文雅的闲文、别号、吉语等皆可入印，如齐白石的印章中有“白石长寿”“老白”“阿芝”“木人”“三百石印富翁”等，这些看似近俗的

文辞使小小篆刻获得了新意，平增了额外的品趣。

跳出艺术的视阈，以更加广阔的人文视野来审视，篆刻的人文内涵高度契合了历史文化的理念。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们可以通过外部的观察和内心的省悟来认识世界的本质和规律，因为世界万物相互关联且蕴含着共同的最高准则。因此，道家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儒家则相信天人感应、天人合一。既然人的心灵可以悟通天地、穷神化境，那么由人所创造的艺术，便如这小小的方印，也势必承载了注解和喻示万物之道的神圣使命。

玉石也好，金银也罢，初始都不过是冰冷生硬的材质。当篆刻家起刀之后，在一冲一切之间，顿时赋予了它神奇的能量。印成之后，既可以是令群雄逐鹿的传国玉玺，又可以是随身把玩的私刻闲章；既用于关乎民生的文书公函，又用于彰显个性的书画信笺。工艺、书法、文学等领域的精华可蕴藏其中，美丑、刚柔、阴阳等方面的哲学能包含其内，一方小巧的天地可浓缩众多美学与智慧。《道德经》曰：“万物之始，大道至简，衍化至繁。”篆刻以其特有的文化形态生动诠释了这句话的奥义。



张克，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副教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国家治理、公共政策，重点关注中国国家治理的独特机制、领导干部治理能力建设。

读大学以前，我一直生活在广东省一个由小渔村发展起来的城市。1978年，那里流传着一首歌谣：“宝安有三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间屋里九间空，家里只剩老和小。”然而，在改革开放后不到40年时间里，这个默默无闻的小渔村成长为拥有2000多万人口的现代化国际都市，她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缩影——深圳。英国《经济学家》杂志评价说，“全世界超过4000个经济特区，头号成功典范莫过于‘深圳’”。

深圳的成功是偶然还是必然？我们可以从深圳的跨越式发展过程中探寻中国治理的“密码”。

没有政策试验就没有改革开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但是，改革开放究竟怎么改？当时大部分人还是一头雾水。因为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就叫做特区。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经济特区是一个新生事物，有人支持也有人反对，改革面对着一一些阻力和压力。深圳特区第一任市委书记吴南生，是延安时期中央党校的老学员，他主动请缨办特区。深圳率先引进外资搞市场经济，全国各地有不少非议，吴南生义无反顾，体现了改革者的担当。经过40多年的不懈探索，深圳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发挥了“试验田”的重要作用，为全国提供了许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可见，没有政策试验就没有改革开放的顺利推进。

从公共政策理论视角看，政策试验是理解中国治理的一个独特机制，深圳是中国政策试验最为成功的案例之一。简单地说，政策试验就是国家在制定颁布全国性政策之前，先选择局部地区或行业进行试点试验，在取得可行经验后再向全国推广的过程。

1982年，时任河北省正定县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亲自推动了一场政策试验。当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南方几个省份试点成效显著。习近平同志通过调研发现，在农业大县正定，农民干啥没有什么积极性，老百姓吃不饱肚子。于是，他建议县委县政府学习南方省份的先进经验，搞大包干试点。根据习近平同志的意见，正定选了里双店公社搞“大包干”试点，开了河北全省“大包干”的先河。只用了一年时间，就实现了公社农业产值和社员人均收入双提升。

党的十四大将“大胆试验，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写入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一直延续至今。2013年，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全面

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的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

总之，政策试验发源于革命战争年代，大规模兴起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以来广泛应用于治国理政各领域，是中国共产党历经近百年探索创造的独特治理经验。

政策试验降低决策成本

除了经济改革之外，在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的民生领域，政策试验也在发挥重要作用。

2018年，“天价药”现象引发社会关注。17种抗癌药就被一次性纳入国家医保报销目录，许多原本负担不起的患者可以用得上新药了。这项大动作是新成立的国家医疗保障局运用强大的战略购买力和话语权为老百姓办的一件民生实事。

2018年，从中央到省市县各级政府都成立了一个新机构——医疗保障局。新成立的医疗保障局成为中国最大的药品采购方。这是中国医疗改革的一项重大顶层设计，它起源于福建省三明市2012年开始的一场医疗改革政策试验。三明经验经过了实践的检验，最终走向了全国。

当我们面临一些情况较为复杂的改革问题例如医疗改革问题时，通常决策需要反复试验，才能找到最佳方案。政策试验能够有效避免改革“翻烙饼”，将真正管用的改革举措向全国推广。

政策试验形成示范效应

政策试验能够帮助的人群，远比我们想象的多，或许你已经享受过它带来的红利。过去到全国各地调研时，经常听到反映到政府办事难的问题。最近两年，越来越多的地方提出了让老百姓到政府办事“最多跑一次”的承诺。

“最多跑一次”改革起源于浙江省衢州，一个经济并不十分发达的山市区。2016年，浙江省针对群众反映突出的办事难问题，提出了倒逼政府自身改革的目标——让群众和企业到政府办事“最多跑一次”。他们通过流程优化、数据共享，让越来越多事项办理能够实现只跑一次。

浙江探索的“最多跑一次”改革取得成效后，各地争相学习推出了不少类似的改革，有的叫“只跑一次”“一次办好”等等。政策试验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会被其他地区比学赶超，在全国形成示范效应，促进各地之间的良性竞争，为更多老百姓提供更好的服务。

推动政策试验与顶层设计有机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摸着石头过河，是富

中国治理的政策密码

□ 张克

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摸规律，从实践中获得真知。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是辩证统一的，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要在加强顶层设计的前提下进行，加强顶层设计要在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的基础上来谋划。

一个具有强大治理能力的国家，必须拥有开放、灵活的决策机制，以便及时回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政策试验是一种独特的治理机制，能够帮助中国不断适应各种风险挑战，以较低的决策成本，调动地方探索的积极性，最终为全局性改革奠定坚实的基础。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作出决定，要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正在走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前进道路上的每一步都需要勇于探索、敢为人先。只要不断坚持和完善新中国成立70年来积累的宝贵经验，将政策试验与顶层设计有机结合起来，中国的治理现代化就一定能够行稳致远，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